

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接住了老院长的问话：我们的成绩和各项数据指标都很好，只是我们没有说而已。清华不是讲“行胜于言”吗？没有想到的是，朱镕基老院长却十分认真地说道：“行胜于言，可不是不言啊！”坦率地说，这也非常清晰地阐明了“行胜于言”的内涵。而且，他的批评实际上也揭示了清华大学办学中的一个短板：缺乏必要的宣传，同时，对自己的

工作和成就未能进行很好的总结，在提炼有示范性和参考性的经验方面做得不够。这件事给所有在场的清华大学领导和教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得大家对“行胜于言”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行胜于言”的校风已经融入了清华大学的血脉和骨子里，成为清华人共同的精神财富和格调。

## 理工男的人文情结

### ——从几件收藏看当年清华园学生生活的文化氛围

○陈家宝（1968届无线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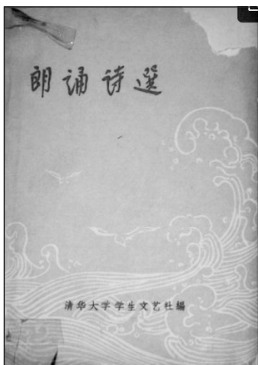
陈家宝学长

2021年是母校建校110周年。看到校友总会征集有关纪念文章，于是找到了几件收藏，不由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前半段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我是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当时处于三年经济困难的恢复时期，除了紧张的学习生活、有节奏的体育锻炼，还有许多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这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通过考核方式参加学生

文艺社团或体育代表队。

或许是因为高考作文成绩比较好，我慕名选择了学生文艺社，其实也就是文学社。记得入校时，文艺社还设在明斋东头，和学生会办公室隔着一间盥洗室。文艺社组织上属于学生文艺社团，业务上由党委宣传部指导。当时的社长是自动控制系顾乃平和陈大义。后来集中搬到二号楼三楼东侧正中间，社长是工程化学系谢新佑，政治辅导员是自动控制系印甫盛。我在二年级时也离开东区班级住所集中到二号楼，记得是3022室。当时，文艺社设有诗歌组、电影评论组和小说散文组。

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诗歌显然最能激起年轻人的热情。由著名诗人臧克家主编的《诗刊》杂志和大学生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是1963年暑假，《诗刊》社在首都剧场举办的“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诞生七十周年诗歌朗诵会”就专门邀请我们参加。朗诵会上，北京人艺于是之、朱琳等



「朗誦詩選」封面  
詩人臧克家專門題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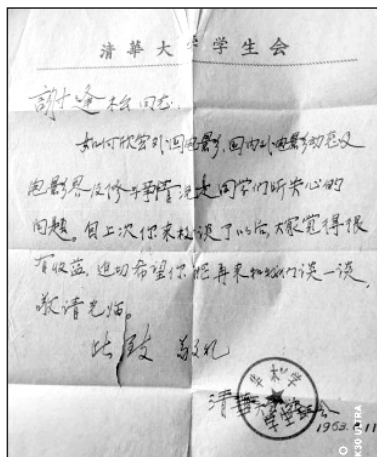
著名演员的精彩表演令我们终身难忘。至今我还珍藏着这张宝贵的“观摩券”。

为推动群众性的诗歌朗诵活动的全面展开，在学校党委宣传部领导下，新学期一开始，我们就紧张地展开了《朗诵诗选》的编撰工作。其间，文艺社老社长徐葆耕老师和校团委宣传部林功实老师也经常来指导工作。终于在1963年底成功出版并在全校师生中发放。诗人臧克家专门为《朗诵诗选》封面题字。封面则是惊涛骇浪中的海燕，意味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高尔基语）。蒋南翔校长在题词中写道：“文艺创作是教育青年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可以相信生活在清华园的同学和其他同志们，将会对这些诗歌感到亲切……未来的红色工程师，不但需要科学知识和生产劳动的锻炼，而且需要吸收革命文艺精神食粮。科学、劳动和优秀文学艺术的密切结合，将能产生移风易俗的最伟大的力量。”《朗诵诗选》的编撰发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已毕业校友和各地大专院校甚至中小学校都纷纷索要。1964年3月又增印5000本仍然供不应求，社会上竟然出现了“手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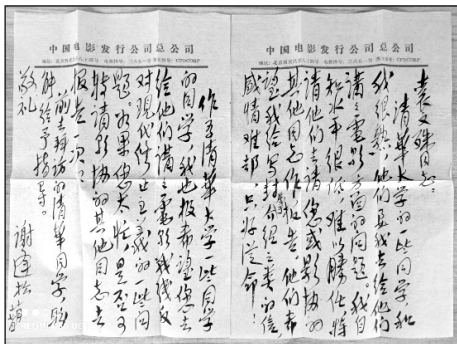
“诗言志”，这本诗集选择了著名诗人臧克家、贺敬之、光未然等大家耳熟能

详又朗朗上口的精品。《朗诵诗选》出版后，校园里到处可以听到抑扬顿挫的朗诵声，大都取自这本诗选。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尽管南腔北调，却都爱上了它。

当时电视还没有普及，电影则成为人们业余文化生活的主要食粮。那时大礼堂放映的电影每周多达二十几场。影片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有外国影片《白痴》《白夜》《欧也尼·葛兰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也有国产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当然也不缺后来饱受争议的《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为了满足广大同学对电影动态的了解，当然也是为了引导大家正确欣赏各类影片，由清华大学学生会出面，和中国电影总公司联系并邀请负责宣传工作的电影评论家谢逢松来校座谈。作为后来的中国作协、书协、影协成员，多才多艺的谢老师广征博引、谈笑风生，跟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特别是《早春二月》放映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因此我们想再次请他来校作一次讲座。没想到由此却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以下是收藏的学生会邀请函。



由于谢逢松公务繁忙，过了两个月他来函给我们推荐了他的广东老乡、时任中国影协党组书记（原上影厂厂长）袁文殊。这当然令我们喜出望外。信件内容如下：



遗憾的是作为中国影协一把手的袁文殊同志当时也很忙，不过他又给我们牵线了《早春二月》导演谢铁骊。由此，我们到谢家拜访了这位著名导演，还到影协见到了当时众多著名演员并商定了来校安排细节。

好像是1964年春夏之交一个假日吧，由北影厂谢铁骊导演率领《早春二月》一众人马，包括孙道临、上官云珠、谢芳、高博等乘影协的一辆中巴来到清华园。由于《早春二月》刚上映不久且争议颇多，故在校园引起较大反响。原来外来讲座大多安排在阶梯教室，这次特地安排在大礼堂。应该说，《早春二月》是新中国成立14年来电影界的一朵奇葩，它就像一首清新优美的小诗，在舒缓的故事进程中运用丰富的电影语言，深入细致地描绘人物的内心情感波动，并转换成戏剧情节的冲突。讲台上，谢导就影片的拍摄过程和逸闻趣事娓娓而谈，并逐一介绍了各位剧组人员。相对于上官云珠和高博的矜持儒雅，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孙道临的朗诵

和谢芳的风采。当年深受一代青年喜欢的电影《青春之歌》主角林道静的扮演者正是谢芳。当天她身穿白上衣配蓝色连衣裙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的精彩讲座得到台下师生的热烈反应。记得结束的时候天色已晚，学生食堂已经关门，时任学生会主席张福森学长带领我们一拨工作人员到照澜院吃烧饼，权当工作餐了。

此后，影评组经常组织同学参与电影评论，从中得到学习和提高。1965年，中央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首都民兵苦练杀敌本领的彩色纪录片《紧握手中枪》，并在北京首演。我和文艺社戴国珍、刘棣华合作的《纪录片〈紧握手中枪〉观后》，刊登在《电影艺术》1965年第4期上。文末配图上还展现了清华学生摩托车队飒爽英姿的“摩托兵”身影。

大家都知道，清华图书馆历来座无虚席。除了科学文献资料外，中外名著的借阅柜台也经常排起长队。当然包括《红楼梦》等四大名著，也包括如《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傲慢与偏见》《巴黎圣母院》《基督山恩仇记》等外国名著。为了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课外阅读，在当时反修、防修的政治背景下，学校没有“如临大敌”，而是循循善诱。在宣传部领导下，文艺社组织了多次专题阅读交流座谈会。我们探讨如何看待《红与黑》中主人公于连的个人奋斗道路，甚至还探讨《红楼梦》中的民主思想，细究大观园的建筑结构。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既见了世面又接受了“反面教育”，这样学生看小说也就名正言顺了。

当时学校还经常举办各种讲座，这些活动通常是在科学馆北侧的阶梯教室举行。得地利之便，我们经常得到北大人文

## □ 荷花池

大师的指点，正好弥补了清华文科缺失的短板。记得有一次邀请现代美学家、北大教授朱光潜来校讲学，讲到青年人如何欣赏美，他信手在黑板上勾画了一个苏联姑娘发型，长长的头发用一根彩带高高地束起，从侧面看活像翘起的马尾巴。这用现代的尺度看，只能算一种司空见惯的个性打扮，可笑的是在当时却被看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真是匪夷所思。还有一次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北大侯仁之教授到校，给我们讲授了各地的地理风貌，尤其是介绍了北京著名景点的地貌特征和风土人情。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的北大教授王力也曾在这里作过关于语言和文学的讲座。

大礼堂自然是师生的文化生活重镇。除了放映电影，节假日还经常有学生文艺社团自编自演的各种节目。张剑、肖运鸿、吴亭莉的独唱，胡泊的朗诵等都是很受欢迎的个人节目。军乐队创作的《体育进行曲》《胜利进行曲》，话剧队排演的《清华园的早晨》《年青的一代》，京剧队自编的《关羽搬家》《土电厂之歌》，舞蹈队的《鄂尔多斯舞》《罐舞》等也很受欢迎，我校还有100多人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气势恢宏的《东方红》大合唱。同样，大礼堂还曾经回荡着著名钢琴家殷承宗美妙的琴声，还让我们领教了花腔女高音张权的气息运用技巧。同时，在清华园西北角还有一座不起眼的“灰楼”，从那里经常会飘出《舒伯特钢琴曲》《梦幻曲》《小夜曲》等乐章和悠扬的歌声。军乐队、民乐队也都在这里排练。这里可是这些理工生妙不可言的音乐殿堂。当然，也不乏大家关心的时政讲座。原驻英大使、著名外交家宦乡就曾两

次来校给师生作精彩的国际形势报告。

到1965年秋天，四、五、六年级的高班学生都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也随文艺社团到延庆永宁分团参加“四清”工作队。该分团由党委副书记刘冰直接挂帅。就文艺社来说，当时的骨干如力6蒋家羚、无7张永祥、化8李衍平、量8孙立中等都下乡了。在学生文艺社团团长胡锦涛和党支部书记印甫盛带领下，留校的社团干得有声有色。当时文艺社留校的骨干有物0郑元芳、给0万润南、水0边国政、无9马朋捷、自9傅烈、自0谭昌龄、建00赵克明等。在印甫盛的直接指导下，他们承办了校刊《新清华》的文艺副刊。《新清华》在清华园有广泛的影响，每周出版一期，是清华师生必看的报纸。在文艺副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同学们发表的诗歌、散文和短小精干的“小小说”。边国政同学的成名作《清华园之夜》就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如今谈起当年办报的时光，印书记那深邃的目光，还有负责审稿的老师，如严格拘谨的郭道晖老师、认真敦厚的孙敦恒老师，大家都觉得分外亲切。文艺社还经常参与校办文艺晚会的节目串词、编导等工作。

当然，下乡的同学也没有忘记应有的人文使命。还记得当时听刘培哲老师给永宁分团作的“四清”情况交流，用的居然是古典小说“章回体”，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到1966年初，“四清”已进入尾声，文化教育战线却烽烟四起。我们也在时刻关注时事进展和学校的信息。5月初，我给《新清华》投了一篇关于教育方针的稿件，收到编辑部来函的措辞却十分耐人寻味。信中一反常态，既不说未采纳，也不说已采用，而是说“我们正在研



究”。可见当时学校的政治文化氛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捉摸不透而令人窒息。

随之进入了“文化大革命”年代，传统的中华文化和西方经典被冲击得荡然无存。那时大礼堂前的草坪周围贴满一大圈大字报，吸引了各地人流的层层围观，却成了清华园的又一道“风景线”。这些扭曲的大字报虽然乏善可陈，也说不上是文学作品，但从沉重的功课中“解脱”出来的这些理科生似乎找到一个发泄的窗口。除去政治因素，就文学角度来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文章体裁多样、观点犀利、语言诙谐，足可以与隔壁的文科生相映成趣。但很快，一息尚存的清华文脉随着时局的发展越发式微，万马齐喑究可哀。

经过十余年的沉寂、思考和磨练，随着文艺春天的到来，这些理工生的文学基因也被逐渐激活。具有代表性的是边国政1979年发表在《诗刊》上的《对一座大山的询问》。全诗热情奔放、慷慨激昂，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拨乱反正的诉求，在全国范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新诗奖”。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边国政又发表了多篇诗集，并成为

省会城市的文联领导人，终于“华丽转身”，完成了理工男向文人的蜕变。而更多的理工生则是把文学当成了副业，光是已出版的诗歌、小说和写实文学就有几十部。当然，理科生最擅长的还是信手拈来夹叙夹议的散文。清华才子叶志江收集了“文革”岁月的回忆文章和思索评论，又不断增加新作并结集成册《走出文革》。五十余万字洋洋洒洒，独自成篇，文字流畅，语言诙谐，可读性强，因而颇受欢迎。其他如吕述祖《老北京风情录》等，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这些无不体现了清华学子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延绵的人文情结。

水木清华，春风化雨。如今的清华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就恢复了人文社会科学。可喜的是，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综合文化素质的培养，专门为理科生设立了“西方文学思潮与作品”“中国文化名著导读”“中国古代诗歌赏析与研讨”等选修课并受到了学生的热捧。中西合璧、文理交融历来是清华的办学传统。值此庆祝母校建校110周年之际，也纪念“清华文学社”成立100周年。祝母校文理并进，人文日新。

2020年12月

## 新词三叠

### ——庆祝建校110周年、毕业50周年

○陈子惠（1970届冶金）

伟哉清华，微我孺子。燃遍通身化作萤，梦里寻她千百度，此境无重数。  
虎啸龙吟，星星点点。自强不息传千古，厚德载物诗满路，钟灵尽毓秀。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五十年华各西东，铸就宝鼎尊一座，矫首同天贺。